

1895—1950年间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 与教学活动述略

杜靖

(青岛大学社会学系, 青岛 266071)

摘要: 1895—1950年间的中国体质人类学活动,既注重研究和教学相结合,又注重体质调查和文化调查相结合,生物与考古并重,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各族群的体质差异,以及人类的演化问题。先期主要由外国学者进入并开展研究和教学活动,后期则主要由中国本土人类学家推动这一工作。另外,此一阶段后期体质人类学发展深受中日战争影响,战争前主要分布于北方、华东和华南,战争爆发期间主要集中于西南,战争后则主要集中于东南和华南。

关键词: 中国体质人类学; 体质调查和测量; 人类学教学

中图法分类号: Q9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08)02-0182-09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和文化的科学。研究人类的体质形态、遗传特征的人类学叫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而以研究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则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人类学最初是在欧洲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它是在某一社会的人们发现了体质形态、语言、风俗习惯与自己不同的人类集团——异人种和异族群——的时候萌生的^[1]。人类学要同时研究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因为它必须了解人类的生物习性和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习俗间有什么关系,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与文化演进是如何建立在人类生物性的基础上的这一事实^[2]。

在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学术实践中,通常说的“人类学”一词指的就是“体质人类学”,而文化人类学则用“民族学”这样一个称谓。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初就设有民族学组,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设人类学和民物学组¹⁾。前者以研究各民族文化为己任,后者除部分研究民族学外,基本上以研究体质人类学为主。以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与史语所合并,改为第四组,增加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始改称人类学组。再后来,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后,体质人类学部分析出,又恢复民族学组之名称^[3]。

从人类学在中国产生到1950年的大半个世纪里,中国体质人类学虽然始终未能酝酿、发展为一门学科,但其实绩着实不可低估。然而迄今为止,专题论文不多,仅有王建民《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概述》一文予以探讨;此外也有几篇英文论文涉及此题,惟不够细致和全面。又,尽管此前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已有学术专著《中国民族学史》(上卷)对其梳理论析,可是王建民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却疏散于整个专著之中,而且他在此书中的

收稿日期: 2006-10-17; 定稿日期: 2006-12-10

作者简介: 杜靖(1966),男,山东临沂人,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湖北经济学院社会政策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人类学学科理论与发展史、汉人宗族与社会研究。E-mail: dujing1966@tom.com

1)之所以称之为“民物学组”,当时有搜集并研究民族器物或文物的意图。

学术中心任务在于建构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因而他的论述体质人类学是服务于论述文化人类学。本文在王建民资料搜集与爬梳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时段的体质人类学活动进行简要的集中梳理,目的想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质人类学发展的面貌,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奠定一些基础。希望各位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1 外国学者在华学术活动

最初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是外国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西方一批传教士和探险家进入中国开始记录各个族群的文化生活。继之,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来华讲学和从事人类学考察,直至1940年代末期。

日本人类学的创始人鸟居龙藏把一生的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早在1895年他就到辽东半岛进行考察,1895年到1900年四次对台湾高山族实地调查。1902年7月到1903年3月他深入我国西南对湘、黔、滇、川等地的苗、瑶、彝、布依等族调研。1906—1908年,他又对蒙古进行调查。1919年、1920年、1928年他三度对西伯利亚东部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这些考察除了研究诸民族的服饰、居住、语言、习俗等文化内容外,还对他们的分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进行了记录,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古工作^[3]。他一生著有《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蒙古及满洲》和《黑龙江和北桦太》等著作。1930年代后半期,他先后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从事人类学教学工作。

此后,陆续有一批日本人类学家进入台湾,从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即便二战以后,原在台湾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教室”任教的一些日本学者仍旧留在了台北,其中金关丈夫在那里讲授体质人类学课程。

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于1912年—1913年率领“沙皇中国东北考察团”,对通古斯和满族进行了人类学调查,这次调查除了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外,还包括大量的体质人类学的内容^[4]。史禄国在俄国是一位颇受看重的学者,他是一位研究通古斯文化的专家,26岁当选院士。从1913年到1918年,他又多次对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进行调查。然而十月革命后,史禄国的学术研究在本国却渐渐失去宠爱,被迫流落到中国^[5]。来华后,他最初的一段时间是在华东、华南区域开展调查。他利用在华北、华南和华东搜集到的大量体质人类学资料,先后于1923年和1925年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著作:《中国北方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North China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1923)和《华东和广东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1925)。在这两书中史氏通过对不同体质人类学指数的统计和比较,就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迁徙和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3]。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史禄国来厦门大学任教,进行了“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成长测验”等课题^[6]。中山大学自1925年成立起,就建立民族学和人类学课程,提倡相关的实地调查。中山大学于1927年7、8月间开始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傅斯年为筹备主任(后为首任所长),聘傅斯年、顾颉刚和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为教授。1928年1月,语言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该所侧重广东及邻省珠江流域的体质人类学和各民族文化研究^[7]。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筹备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9月正式成立,该所先后设8个工作组,其中第七组是人类学工作室,由史禄国领导。不久之后,该组

在史氏带领下对广州的学校的男女生进行测量,进行华南人种发育研究^[8]。1928年7月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四人,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前往云南进行相关族群的人类学调查。他们由广州出发后,经香港、安南,到达昆明。他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人进行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以此作为他对南方中国人体发育研究的一部分,当年10月返回广州^[9]。从滇回来后,他又对广州的驻军士兵进行体质测量。东南、华南区域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完毕后,史禄国夫妇返回北京,时间是1929年,落脚点在清华大学。他回到北平以后用英文发表了《中国人体发育论》,并用英文撰述《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之初稿。这部书稿是对他关于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在完成了华南和西南的有关体质人类学研究后,史禄国计划完成《中国北方人类学·第二部》和《中国西北人类学》的体质方面的大规模调查和写作,可惜未能继续。不过,他留在了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传播体质人类学的知识。

1933年吴文藻把费孝通推荐给史禄国。史禄国为费制订了一个长期计划,前两年进行体质人类学训练,中间两年进行语言学训练,后两年完成“心智”(Psychomental)训练,即文化的训练。由于其他原因,这个计划只完成了前两年。^[4]起初,史禄国把费孝通安排进了研究人类学所需要的生物学实验室。让他开始学习生物的演化,了解从生命的开始到人类的直立行走,并花费长时间去指导费孝通解剖各种动物,学习人体测量,研究人体的类型。实验室训练结束后,史禄国安排费孝通去做实际的人体测量。费孝通每周两次骑马去驻清河的部队兵营,对士兵进行人体测量。之后,史禄国又安排费去北京监狱测量犯人的体质。在这两个地方,费孝通总共测量了约600个人体数据。这构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的重要基础^[5]。

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 II)于1918-1923年间曾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给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广东的体质人类学记录。当时他的调查工具和方法都是从史禄国那里学到的,并且得到了史禄国的田野指导。他利用田野调查资料进行了特定区域的种族分析,同时跟山东、浙江等地的材料进行了比较,认为凤凰村人跟华南人群体质特征非常接近,同时跟华北和华东人群也存在密切的体质关联,从而得出结论:凤凰村人的祖先跟北方群体存有血缘关系,凤凰村人是北方移民和当地原著民的混血儿。^[10]

除了史禄国和葛学溥外,20世纪前半期还有其他外国人类学家来华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瑞典顾问安特生(Andersson, Johan Gunnar)等人发现了北京周口店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遗址(1912年4月安特生在中国河南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1926年在北京猿人遗址又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周口店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对于探索人类的产生和中国民族的来源和构成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于1931年—1932年聘请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H. Stubel)为特约研究员(早在1929年,史图博和李化民就到达浙南、闽北地区的畲族进行调查)。1931年7月史图博对海南黎族和苗族等族群进行调查,次年,他第二次前往海南进行调查,先后累计达数月之久。虽然史图博的研究以文化为主,但也包括极为丰富的体质人类学内容。调查的结果写成《海南岛民族志》(德文版)。1932年春天,由中央研究院聘请、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派遣、中山大学协助,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许文生(Paul H. Stevenson)博士和罗香林一起到广州北部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从事广州人体测量。接下来,许文生到海南岛对黎族进行体质测量。他所涉及的族群有福建的畲、客家和广东的民与黎族^[11]。

抗战时期,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体质。

外国学者在华所进行的体质人类学工作,以调查研究为主,同时也开展教学,帮助我们培养人材,将体质人类学的知识和技术传入我国。

2 抗战前期中国人类学家的研究与教学

体质人类学进入中国的另一条线路是中国学者到西方留学,然后把人类学带回本土,并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中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是这一时期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成就最大的两家。

最早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中国人是丁文江,他于 1914 年就对云南和四川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测量。

1918 年李济毕业于清华,然后赴美留学,先是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1923 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作短暂停留后,进入了清华大学。他在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考古学讲师,招收人类学专业“中国人种考”的研究生,吴金鼎随李济学习人类学,但是有关课程以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为主。李济在清华大学正式任教前,于 1925 年夏,曾到湖北黄陂、黄冈等地进行体质测量,从身高、鼻阔和颅圆等方面发现鄂西北与鄂东南居民体质构造差别颇大,其成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翌年,他又到山西介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12]。1926 年他又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1926 年清华建立社会学系。1928 年清华大学改社会学系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现将 1934 年—1935 年度的清华大学的“人类学组”(另两个组是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课程详细记录如下:

(甲)全校共同必修课程:国文、第一年英文、通史(西洋通史或中国通史)、普通生物学、高级算学或论理学、第一年第二外国语、第二年第二外国语;(乙)本系共同必修课程:社会学原理、社会机关参观、社会研究法入门、社会调查、社会思想史、初等统计学、社会心理学;(丙)人类学组必修课程:初民社会、人类学、比较解剖学、体质人类学;(丁)本系选修课程:都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家庭演化、家庭问题、优生学、人才学、劳工问题、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中国人口问题、贫穷、犯罪学、社会运动、社会组织、社会变迁;(戊)他系选修课程: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地理学、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社会立法(当时校中未开此课)、伦理学、心理概学论。

从这份课表可以看出,清华大学人类学组分成必修课与选修课两种。普通人类学主要讨论人类学在科学系统中的地位、人种分类的方法和标准、人种单位之理论、演化新论、现存人种的普通分析。体质人类学主要教授(1)体质人类学的定义、范围、方法和名称;(2)人体构造、骨骼及形态;(3)人体生理、心理、病理;(4)遗传、选种、变异等;(5)人种方面涉及人种单位及文化之影响;(6)比较方面涉及哺乳动物、人种分类、人的历史;(6)应用方面的内容有优生学、犯罪学、教育学和社会选择等。而“初民社会”课程主要以“北通古斯族”为例,讨论初民社会之简单组织,以便于与其他民族比较^[13]。很多课程仍由史禄国讲授。

据中央研究院的档案,1928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第一组为民族学

组,同年9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其中设人类学组和民物学组²⁾。民物学组是第三组,成立不久后,其研究人员吴金鼎就对山东的人群进行过测量和调查^[4]。吴金鼎是“龙山文化”的发现人,著有《山东人体质之研究》。1926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1929年12月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

1934年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山东大学生物学系、两广地质调查研究所等机构联合组成海南生物科学考察团,分成动物学、植物学、人种学和地质学四个小组。这次由生物学界和地质学界的学者组成的科考队为中国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其中由中国科学社编辑兼图书馆馆长刘咸所率领的人类学组曾获得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之资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影响较大^[3]。

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编辑陶云逵等对云南进行民族调查。他们兵分两路,其中陶云逵一路调查区域主要为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调查人种和语言。陶云逵一组携带了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³⁾、发色表、照相机等先进设备。陶云逵对云南傈僳族的文化和傣族的体质、生育婚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6]。

另外,大量专门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也兼顾到了体质调查,把体质调查和文化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目的想搞清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体质特点,发现他们体质的同构性和差异性。在中央研究院的历次调查中体质调查都占有相当份额,陶云逵的上述调查就是以体质人类学为主,凌纯声的1929年4月到7月间的东北赫哲族调查和1933年的湘西苗人调查都有体质项目。费孝通1935年的瑶族调查,也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测量。费孝通在“研究计划书”中说:“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型类别外,尚可藉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其方法则赖人体测量,遍量人体各部之长宽、周围、色彩、形状,然后用统计方法加以分析,以获结论。”^[5]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最主要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工作划归史语所,第四组就是民族学组。吴定良1934年从欧洲回来后进入史语所,民族学组更名人类学组,吴定良任主任,从而加强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使体质和文化研究并重^[15]。

2) 关于中研院人类学组的建立问题,目前有两份不同的文献。一份是本文所使用的中央研究院的档案,一份是195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观点是: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电邀吴定良回国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吴定良回国时即到南京赴任,当时的所长为傅斯年先生。其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下面原只有三个组:第一组是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先生;第二组语言组,主任为赵元任先生;第三组为考古组,主任为李济先生。1934年创建了第四组,其因缘据李济称:“1934年,遵照刚担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丁文江博士的建议,研究所新设了一个人类学组,并聘请就学于卡尔·皮尔逊生物测量学实验室的吴定良主持该组的工作。这个组的工作范围虽包括人类学各不同方面的研究,但分派给吴定良的直接任务则是研究考古组在野外收集并迅速积累起来的商代人骨。”(自“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一文,原文为英文,载1954年台湾出版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译文引自《安阳殷墟头骨研究》1985年一书)。本文之所以采取档案数据,是考虑到后者是一篇事后的总结性文章。不过,这一问题仍事关重大,因为它涉及到中国人类学组究竟是在1928年建立,还是在1934年才设立,以及怎样的场景下设立的问题。本文在择其一的情况下,附注另一说法,希望给有志于此一问题研究的专家提供线索和思考的空间。

3) 当时就称之为“皮色”,而不是如现在人类学界所通行的术语“肤色”一词,档案为证。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内陆高校大量向西部和西南部迁移。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体质人类学的探究。我们看到,战时体质人类学的调查都集中于西南地区。

3 抗战期间本土人类学家的活动

中央研究院对于体质人类学有着专门的研究,将中国各民族体质的调查作为其主要内容。吴定良1926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先后获得生物统计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在民族学组改为人类学组后,由吴定良主持该组工作,开始更多关注体质研究。1944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担任主任。吴定良、吴汝康及张洪夔等人于1941年8月开始到该年年底,对贵州“青苗、坝苗、水苗、补龙苗、仲家、打牙佬与披袍佬”等民族和族群进行调查。该组在调查中得到体质测量材料2000余份及民族文化和人口统计资料。1942年,吴定良又和张洪夔到贵州的大定(今大方)、毕节、威宁、纳雍等地,再次对苗族支系中的大花苗、小花苗及彝族的不同支系等族群的文化与体质进行调查。该组对于贵州苗、彝、佬、布依、汉等民族的调查,是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文化调查结合起来。其研究题目是“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主要研究题目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贵州佬之体质”、“贵州仲家之体质”、“贵州倮倮体质调查报告”、“倮倮之体质”、“华族血型分析”等^[16]。总起来说,从抗战开始到1944年4月,该组体质人类学有“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罗罗体质之研究”、“殷墟颅骨研究”、“中国人趾骨与跗骨之比较研究”、“中国人发旋之统计”、“各族下额骨孔位置之比较”、“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锁骨之研究”等重要研究成果^[17]。

1943年7月蒋介石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要求以科学方法对民族素质作多方面研究。研究项目有生物基础、营养环境等四个方面,以吴定良为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承担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他们将生物遗传、血缘与人材的关系、望族家谱之分析和人类选种之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短期调研^[18]。西南联大时期的潘光旦也曾就优生优育、民族素质等问题做过研究。

1943年林耀华先生率领边区考察团到大、小凉山倮倮⁴⁾聚居区进行考察,他们以小凉山的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的样本,进行文化和体质方面的研究,之后又进行了大凉山彝人考察,日后撰写了《凉山彝家》。这改变了早年只重视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不过,体质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放入该书^[19]。马长寿也对川康民族进行体质调查。1943年暑期,同济大学医学院方超带领两名学生到雷波测量彝人体质^[19]。

王建民认为,抗战时期的这些体质人类学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采取体质人类学的数据收集技术和现代统计学分析手段,借助于各民族体质测量,试图对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体质与民族分类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的科学认识。也就说,用现代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搜集方法获得大量体质人类学指标数据,以说明民族分类的体质人类学根据以及民族的起源,进而解释文化与体质的关系^[3]。

4) 此处的“倮倮”与上文的“罗罗”都是指彝族,是一个族群自称。

4 抗战后期体质人类学的开展

抗战结束以后,一些东部大学陆续撤回内地,相应地也改变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区域格局。这一时期的体质人类学学术实践主要集中于我国东南地区和华南地区。

1946年秋天,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撤消了。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前往浙江大学工作。1947年春天,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增设人类学组,吴定良任组长。同年秋天,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创立,吴定良担任系主任,并于当年秋季开始招生。吴定良⁵⁾开设了体质人类学课程^[20]。这一段时间先后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的除吴定良外,还有田汝康、张宗汉、金祖同等著名学者。可以说,浙江大学的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由吴定良一手策划和积极推进的。1948年秋季,该系计划的研究课题有吴定良主持的“浙东成人体质研究”、“杭州市儿童体质发育程序”、“近代华族颅骨研究”,张宗汉担任的“浙江人血型研究”,金祖同担任的“台湾高山族原始文化”和田汝康担任的“婆罗洲土著人类学研究”等^[21]。为了能够开展研究工作,吴定良等人设法多方筹集资金,1947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拨给吴定良500万元,以资助“浙江畚族生活与体质调查”项目^[22],之后又给予1000万元。由于筹集到多笔款子,浙江大学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项目得以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成绩最为卓著者。1949年夏天,杭州解放,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在新的形势下提出改制问题,其中就申明要训练有关实用之体质检验人员的教学目标^[23]。

1947年秋天中山大学在数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的目的之一在于根据体质人类学测量的结果,以促进民众健康;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人类学促进民族学成为当时一些学者试图重振民族学研究的路径之一。杨成志主理该系,他在学术理念和课程体系上向美国学术体系靠拢。该校人类学系创建时,设立必修课20门,包括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世界人种志等必修课程;选修课20门,包括种族学、遗传或优生学、人体测量法等^[24]。

1947年6月暨南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刘咸任系主任。

此外,一批中国大陆人类学家也随国民党迁到台湾,于1949年秋建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李济担任主任。之前,即1949年7月,以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绍馨为团长,李济、董作宾等为团员组成调查团,到台中县调查瑞岩高山族泰雅人的体质与文化。

5 结 论

回顾半个世纪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笔者发现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最初由外国人开始在我国作研究,之后我国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体质人类学,然后回国研究,最后我国又主动邀请一些西方学者来华开展工作。

第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自然性上解释各族群的特征,或者差异以及联系。

5) 关于吴定良离开中央研究院前往浙江大学工作问题,中央研究院的档案和《浙大百年荣辱史》说法不一,本文取中央研究院档案。由于涉及文献撰述心态和学术伦理问题,本文不作评价和交代。有兴趣的学者可以进行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的追踪性思考。

第三、研究和教学相结合,即重视调查,也重视培养学科发展的后备人材。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原有的体质人类学基础并不宽厚和坚实,它尚不能够作为一个大的专业独立建系。另外,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这些特点与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始终。

第四、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战争以前北方、华东和华南的调查都有分布,战争期间主要局限于西南地区,战争结束以后则主要集中于东南和华南一带。

第五、尽管在个别学者身上有所侧重,但就整体而言,20 世纪前半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始终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相结合,既重视调查体质,也重视调查文化习俗。越是向后期,这种合流现象越突出,指导思想也越明确。

——在此需要指出,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不同的体质人类学家也在追随不同的力量。诚如上文最后指出,华东地区的人类学队伍部分骨干学者早在 1949 年随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前往台湾,另一部分人类学家则留了下来。1952 年大规模全国院系调整之后,从系科建制上看,大陆所有人类学系都被取消了。除了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等机构改建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之外,只是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中保留了一个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人类学教研室。因而,留在大陆的其它体质人类学学者也大多都陆续改行了,或去生物学系,或去搞考古学或地质学。其中,最为有名的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和刘咸一起到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室工作,吴定良担任该研究室主任。酝酿和发展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就这样花果飘零了。

院系调整之后,各学科划分进一步细化,条块分割加重,体质人类学被划分到生物学学科中,因此贴上了“自然科学”的标签。中国几十年来所实行的学术管理和发 展体制,造就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也造成了隶属单位之间的相互隔膜,文化人类学和仅仅容纳体质部分的“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学者之间也减少了相互协作。原本在解放前已经开始走向整合的研究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当时被称为人类学的体质人类学逐渐分离。不过近年来我们看到,在三峡文化保护项目和艾滋病防治等项目上,以及在筹办 2008 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过程中,两个学科的专家又走到了一起进行了诸多合作。我们期盼着中国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未来能够再度合作,并在时机成熟之际实现整合,而国家的学科体制也应该考虑给予其一级学科的地位。

致谢:追随业师王建民先生治中国人类学学术史已有数年,没有他的引导和提携,笔者将无法进入这一领域。此次论文撰写过程中,他慷慨允许我使用他多年来搜集的资料,我将心存感激。同时,非常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以及给笔者所提供的资料。因而,本文应视作一个集体的学术成果,在此愿意认同他们为本文之作者。

参考文献:

- [1] 石川荣吉主编,周星,周庆明,徐平等译.现代文化人类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F3.
- [2]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3-6.
- [3]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5-6; 61-62; 88; 249; 177.
- [4] 顾定国(Gregory E. Guklin)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轶史——从马凌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The Sage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8-60.
- [5] 张冠生.青山踏遍·费孝通[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23; 18-25; 29-30.

- [6] 黄宗实, 郑文贞. 厦门大学校史稿[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112-113.
- [7]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招生简章(民国十六年度、民国十七年度)[J].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C](第6集第62、63、64期合刊), 1929-01-16.
- [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Z].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总报告. 南京: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 1929.
- [9]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本所大事记[J].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6集第62、63、64期合刊)[C]. 1929-01-16.
- [10] Daniel Harrison Kulp II.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M]. New York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69-81.
- [11] 罗香林. 海南黎人源出越族考[A]. 青年中国季刊之“创刊号”, 1939.
- [12]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一览[J]. 清华大学年刊, 1925.
- [13] 卞僧慧. 四五十年前我国一个大学人类学系的课程设置[J]. 中国人人类学学会通讯, (115).
- [14] 吴金鼎. 山东体质人类学之研究[Z]. 南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 1931.
- [1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Z]. 中央研究院档案, 393-1373.
- [16]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 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计划书[Z]. 中央研究院档案, 393-2505.
- [1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致总办事处呈[Z]. 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九年度至三十年度报告[Z]. 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Z]. 中央研究院档案, 393-1373.
- [18] 蒋介石. 致朱骝先电[Z]. 中央研究院档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致总办事处函[Z]. 中央研究院档案, 393-2124.
- [19] 林耀华. 凉山彝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1: 121-122.
- [20] 浙江大学. 三十七学年度考试科目[Z]. 浙江大学档案, 53-1-3813.
- [21] 浙江大学. 人类学系研究工作积极进行[N].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号), 1948-10-1.
- [22] 浙江大学. 致教育部代电(1947年5月19日)[Z]. 浙江大学档案, 53-1-239, 藏浙江省档案馆.
- [23] 浙江大学. 人类学系议决改制[N].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2号), 1949-06-03.
- [24] 杨成志. 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N]. 广东日报, 1948-08-2.

A Review to the China's Phys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from 1895 to 1950

DU J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From 1895 to 1950, Chinese physical anthropology paid attention to combine the study with teaching, to integrate physical measurement with cultural investigation, and to keep close links between biology and archaeology. The study purposes of Chinese physical anthropology lied in revealing the physical traits and diversity of nations. In the initial stage,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anthropology had been developed mostly by the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Chinese indigenous scholars pushed it forward.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later stag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prewar days, the studies were made in Northeast China, North China, East China and South China; during the war, the studies were developed in the Southwest China; after the war, th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Southeast and South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 Anthropology teaching